

海峡两岸著名学者
师友录

顾学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海峡两岸著名学者 师 友 录

顾 学 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顾学颉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2

ISBN 7-02-002246-4

I. 海… II. 顾…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3136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31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75插页3

199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9.50 元



作 者 像

節
序
文
集
卷
一
PDG

目 录

卷头语	1
新文化运动闯将、音韵学大师	
——钱玄同先生传略.....	3
附录一 钱玄同主要著述目录.....	17
附录二 吊钱玄同师诗(顾学颉).....	19
附录三 《说文部首今读》后记(钱秉雄).....	20
白话文的开拓者、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先生讲学时的妙语.....	21
国语运动主将、文法学家、教育家	
——黎锦熙先生传略.....	26
附录一 黎锦熙主要著作分类目录.....	37
附录二 选录黎锦熙《劭西诗存》诗六首.....	45
附录三 建议尽快全面整理《黎锦熙日记》(顾学颉).....	46
看完《四库全书》的史学大师	
——陈垣先生.....	50
与日伪作地下斗争、坚贞不屈的爱国学者	
——林尹先生.....	56
附录一 经历简表.....	63
附录二 著作简表.....	64
笺证、考据学大家	
——高步瀛先生.....	67
附录一 高步瀛主要著作表.....	72

附录二 高步瀛遗作《丁丑杂诗》五首	73
记教育家黄建中先生	74
记词学家刘永济先生	
——吊珞珈山上的幽灵之四	83
附录 刘永济词三首	89
记私塾启蒙老师施雨航先生	91
记铁臂沱南侠韩其昌老师	94
(以上十人为业师)	
记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	99
赢输原不定，对弈两三场	
——记聂绀弩同志	108
附录一 聂绀弩诗八首	114
附录二 聂绀弩简介及著作表	116
附录三 杂谈聂绀弩诗(顾学颉)	117
秦灰鼠啮更辛勤	
——记古典戏剧评论家董每戡先生	123
永嘉今日见盟旗	
——记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	131
附录 夏承焘词三首	136
记新文学史家刘绶松	
——吊珞珈山上的幽灵之一	138
附录 刘绶松诗三首	144
记国际关系学家喻亮	
——吊珞珈山上的幽灵之二	146
记女诗人沈祖棻	
——吊珞珈山上的幽灵之三	151
附录 沈祖棻诗词九首	162

阔别五十年，寄书通情愫

——致台湾邱恕鉴兄	165
致台湾刘述先教授公开信	167
顾学颉自叙	169

卷 头 语

一转眼就八十多岁了，时光真是不饶人！每天服各种药物养病之外，精神稍好时，脑子也无法闲住。几十年间许多老师、同事、朋友的音容笑貌，经常在脑子里萦洄激荡。于是，便抽笔随意写上几行回忆。或写他们的学术贡献，高尚品德，嘉言懿行，或写与他们的交往、友情，长长短短，重点各异，有什么写什么，不强求一律。有些报纸、刊物索稿，即交请他们发表，在大陆和台湾共发表了十几篇。历时较长，并无一定的体例、规范。日积月累，不觉已集稿二十来篇，十余万字，已够编成一本小册子的分量。因为这些师友，大多是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教授、诗人、理论家；又分别生活在海峡两岸（除两人外，均已作古），于是暂名这本册子为《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一方面，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一方面，当前两岸冰冻初融，学术交流频繁，希望这本册子，也能在频繁的浪潮中起到一点点微小的积极作用。

师友的情谊，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老师和朋友们，平时对我是那样殷勤教诲、指导，多方切磋、帮助，期望我能在学术、事业上有点成就。尤其在我遭逢坎坷、处境十分困难之际，也并未嫌弃、躲开；反之，还更加关心、慰勉，相煦相濡，使我能泥淖中挣扎奋起，不致奄奄待毙。不仅大陆的师友如此，在海峡彼岸的师友们，同样以更加关注的心情多方探询我的消息——十多年前，我的情况略有好转时，在台湾的一位老师，曾辗转嘱托在新加坡和美国的朋友探问我的近况。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说我已经在某大学任重要职务。他听了，得到很大的安慰。也有

误传我已死去的消息(这都是两岸能间接通讯后,从台湾的朋友处得知的)。其实,都是辗转误传的不实信息。然而,这已足够证明远非金钱势利所能换来的真挚深厚的友情,是人际间最难得最珍贵的东西,是永远值得纪念,中心藏之的。本希望祖国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两岸的师友能重新聚首欢晤;可惜,他们大都已先后作古,无法实现这个梦想;只好凭几行无用的文字来表达哀思和怀念了。

这些师友们,终生献身于学术文化事业:或为开创新文化、新文学而勇往直前;或皓首穷经,兀兀终年;有的还遭到意外的撞击,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也没忘记为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尽自己的职责。他们巨大的贡献,凝聚成为我国学术上一簇簇熠熠发光的瑰宝。同时,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的忠诚爱国者。在敌伪的威迫下,或拒受伪聘,或忧忿而死;甚至敌伪以死相威胁时,仍自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诚不愧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是值得后辈人永远效法的榜样(他们的诗词中,也充满了爱国思想)。他们既是狂者,在文化、学术的高峰上,勇于攀登,多所创获;又是狷者,在人际关系、生活细节上,乐于助人,严于自守,廉洁奉公,节俭自奉,在拜金主义弥漫大地之时,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十全十美的“完人”;我们只可从他们每个人的特点、长处中,汲取我们需要的营养,丰富我们的知识领域,提高我们的品德修养,增强我们的爱国热忱,以求不负于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光荣而重大的现实责任。我写这本小册子,怀念他们,重要的意义也在于此。并不希望标榜声华,忝附骥尾。当然,怀旧之情,人所共有;而九原不作,亦惟对卷兴叹而已!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日)顾学颉谨识
于北京团结湖北里之寓楼,时年八十晋二。

新文化运动闯将、音韵学大师

——钱玄同先生传略

与封建旧文化决裂

在我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五四”启蒙运动中，钱先生精湛的学术造诣，猛勇精晋的战斗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的。我鲁钝不学，仅随钱先生受业三载，对于先生的学行，未能窥其百一，实不足以传写他的全貌；仅就所知一二，简介于下。

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初名师黄，改名夏，字玄同，以字行；号疑古，德潜，逸谷，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浙江吴兴人，先世居县城南之鲍山，先生生长于苏州。父振常，清同治丁卯科举人，任礼部主事、绍兴书院山长；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出其门下。曾与兄振伦同撰《樊南文集补编笺注》行世。先生幼时即随父师，习《尔雅》及诸经，极勤严。光绪庚子年前，兄恂，任驻日本等国外交官，全家迁居日本东京。一九〇六年，因随兄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师范。时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讲学，鼓吹革命思想，遂从章氏习《说文》、音韵之学。同门有黄侃（季刚）、许寿裳（季茀）、周豫才（鲁迅）、朱希祖（逖先）诸人，后皆成学术界名师。因与革命党人往还，并受其思想影响，主张恢复中华，推翻满清统治。宣统末，回国，执教于嘉兴等中学。民国元年，任杭州教育专署科员、视学。次年至北京，任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中；不久，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教授。一九一七年，为传

播新思想影响最大之《新青年》杂志撰稿，赞倡新文化、新文学。次年，与陈独秀、胡适、刘复、沈尹默、李大钊轮流编辑《新青年》，先生鼓吹甚力。并与国语研究会诸人研究确立国语字音标准。迨轰轰烈烈之反帝反封“五四”运动起，先生积极投入战斗，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主张与封建旧文化、旧文学彻底决裂。言论丰采，倾倒一时。又鉴于我国文字繁难，语音复杂，实为推行新文化运动之大碍，乃专致力于文字改革、国语统一运动，凡二十余年，贡献甚大。

一九二三年，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仍任国文系教授。一九二八年兼任主任，兼授各公私立大学课。以文字音韵为主，本其师传，运用科学原理，参考近代学说及新发现资料，不为旧说所局限，综合融化，时有新创，卓然为一代大师。所授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均能用历史进化观点，科学精神，分析评论，存真祛伪，不存门户偏见，惟求其是，既矫正传统盲目信古之弊，又反对当时流行鲁莽非古之风。

先生因少年时代用脑过度，中年又勤于研究、教学，素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症，常头戴健脑器，扶病为学生授课。厥后日寇侵略愈亟，痛感国土日蹙，民族危急，体力益衰。“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因病不克南下，乃复旧名“钱夏”以明志，闭门谢客，拒绝伪聘；托师大秘书汪如川代告后方诸友：钱某决不作汉奸！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脑溢血逝世，终年五十二岁。蔡元培有诗吊之，云：“理想高谈不讳狂，久于大学耀锋芒。古音善续馀杭绪，疑事重增东壁光。开示青年新道路，揄扬白话大文章。可曾预定遗书目？堪与二刘旗鼓当。”著有文字学音篇、文字音韵学诸论文及国语沿革讲义、论文、杂说、论学函牍各若干篇。先生挚友黎锦熙尝为立传，评云：“术业专一而识解宏

通，议论激昂而持躬谨介。”论者以为知言。

创立白话文根据地

先生治学立身，有功于文化、学术，可为后学楷模者，约可分为四个方面，即：“五四”前后，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以半生精力，致力于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诸多建白；对音韵、文字、经学、学术思想等方面专门研究及创获；立身处世、爱国思想及长期教学所树立的榜样。

“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民主，对封建专制而言；科学，对愚昧、落后而言，包括政治、文化两个内容。文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五四”的前一年，新文学运动已萌芽出土，应运而生。文学是测量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似乎成了一条规律。及“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爆发起来时，新文学运动便汇合在这条洪流里澎湃前进。

新文学运动，表面上似乎仅是一个表现形式，即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问题，实质上则是文学应该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即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的问题；并涉及用什么样的文字工具问题。这时，政治方面的反帝、反封、民主；文化方面的科学、文学、文字等几种不同范畴的运动，开始同出一源，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各自独立运行，分头并进，互相呼应。于是，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有封建文化、旧文学的摧毁与衰亡，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有新文字语言工具的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的倡制和推行。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中，钱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激进民主派，战斗在打倒孔家店、反对读经尊孔、反复古的前线上，战斗在为新文学扫清障碍，为文字改革建立阵地的岗位上。

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胡适发表了偏重形式方面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注重内容的用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学革命论》两文，打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局面；但都只提出了一些原则。钱先生紧接着明确地提出坚决彻底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指明了应该打倒的革命对象，说：“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并反对胡适“不用典”有广狭两义的改良主义解释，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文之疵病。”主张写文章不要用典。还主张：“认定白话是文学正宗，……对于腐朽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还指出，反对白话文的有两种人，一是要恢复封建制度的独夫民贼（如袁世凯），一是卑躬屈节，胁肩谄笑的御用文人和文妖，他们利用腐朽的旧文学，作为吹捧、抬轿子和自抬身价的工具，用来吓唬老百姓。若改用白话文，他们就会丧魂落魄，失去了依靠。两种不同的文体，为两种不同对象服务。打倒“谬种”、“妖孽”，正是为了打倒专制、封建制度；提倡白话文，正是为了要实行民主制度。所以，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实质上是民主与封建之争，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从而赋予了新文学运动以新的意义。钱先生以最坚定明确的态度，要彻底淘汰文言文，坚决实行白话文，正是他反对封建、提倡民主的思想的具体表现。

提倡白话文，若仅停留在理论上的讨论，还是纸上谈兵。而且用文言文讨论反对文言文的问题，一面反对、一面又用它，未免滑稽可笑，软弱无力。必须用新工具代替旧货色，才能令人耳目一新，有所遵从。辛亥革命，有人放了第一枪，成了革命英雄。同样，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大胆使用白话文讨论问题的是钱先生，他也是放了可贵的第一枪的英雄。不仅自己放，还要求战友们一起放。于是很快便在文坛上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局势。他认为

为：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的文章，就应该用白话写。他决定以后无论写文、通信，一概用白话。还请陈独秀、胡适、刘复等人以及在《新青年》上写文的人和读者，大家都写白话，自古无的，今后必有。（详见《寄陈独秀》信）在他的实践、倡议和推动下，《新青年》自一九一八年四卷一号起，一律改用白话文，从此，开创了白话文的第一个根据地。

他还考虑到实际应用方面的一些问题，主张：书札要删去浮文客套（现在一般人已不理解，旧时代所谓“八行书”信，收信人多从第二页看起，因为前面都是千篇一律的浮词滥调的恭维话，根本无实际内容，所以他主张应该删去），数目字如百、千、万等改用阿拉伯号码，纪元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元（即现在采用的阳历），书写和书籍要从左到右横写、横排，文章要加标点符号，等等。这些具体、实际、具有革新意义的作法，看起来好像琐碎，无关宏旨；但经过了几十年后，才一一实行。今天，大家都看惯、习以为常了，哪里知道，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得来却非容易。这，就不能不佩服钱先生的眼光远大，注重实用的精神了。

新文学究竟是什么样儿，总得拿出具体的作品给人们看，才能叫人相信、赞成。这方面，钱先生又起了催生的作用。为新文学奠基的第一篇作品、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就是在他的鼓动、催促之下写出来的。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划分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时代。钱先生自己虽未写什么新创作，但他对新文学的倡导、促成的功绩，是不应该忘记的。

深入探讨文字音韵

新文学是整个“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战绩辉煌的战斗方面，

与之同时，文字改革则是战斗的另一方面。它很早已在酝酿，到“五四”，便与其他方面配合一致，更加明确目标，增强阵容，加快步伐，多次修订方案，为此后我国文字改革打下牢固基础。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对汉字进行了第一次以形为主的改革和统一工作；这次，则是从字音上进行改革和统一的文字革命运动，进而走向脱离形体而以音为主的拼音文字的新道路。钱先生自“五四”运动前后一直到逝世，为这个运动，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

他是一位研究很深、造诣很高的文字音韵学专家，对于我国文字的源流变迁，发展前途，以及世界各国文字总的趋向，了如指掌。并基于便民利国目的，认为方块汉字非改不可。他根据对《说文》的研究、统计，从几千年汉字的演变历史看，认为：汉字由象形变为表意，由表意变为表音，本身正走着离形就音的道路，所以再进一步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再就汉字存在的实际缺点看，也必须改革。汉字难认、难写、妨碍教育普及和知识传播。实用上不便编号、检查、排印、打字、打电报等。经过多年研究、体验，一九二三年，他正式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强烈地否定汉字，主张采用拼音文字。反对那些妥协、调和的“灰色革命”，主张要彻底的革命。关于“汉字革命”的具体方案，他曾有多次不同意见，开始不免偏激，如采用外国文字；或拘泥于学理，如完全用国际音标。国音统一问题上，也有过类似情况。但他有实事求是、服从真理的精神，善于从实际得到启发，而汲取别人之长，不护己见，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这种精神，值得后辈学习。

他不仅坐而言，而且能起而行。对于统一国音，推行国语，制定拼音字母，筹划、编纂中国大辞典等工作，无不积极参加，亲自动手。从一九一八年成为国语研究会的成员、研究确定国语

字音工作以后，到去世的二十余年中，凡审音、制符、编书等，总是不辞劳苦地挑重担子，实干，博采众议，时创新见，综合融会，精益求精，务求做到心既安而理既得为止。

因为他是章门的高足，自己的学术造诣很深，所以他的言论主张，当时虽不免惊世骇俗，被民国初年的一帮遗老遗少和后来的一些顽固派所反对，但也无法驳倒他的精深学理和实际功用，因而在社会上、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他被推为国语教科书编辑主任，编辑小学国语教科书，以代替文言文教科书，是我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同年冬，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是我国确立国语字音之始；这次审音工作，大多出于钱先生之手。一九二〇年公布的《国音字典》和一九三二年改订的《国音常用字汇》（一万二千余字，以北京音为标准），也是由他和黎锦熙、赵元任诸人审议而由他最后审核定稿编制的。从此，“国语”运动的语音标准问题才确定了一条合理有效的路线。

文字改革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除了采用什么样的工具、符号和拼写方式，存在各样问题，需要研究讨论修改和试行之外，在政治上、社会舆论上还有极大阻力，需要作大量工作去克服，战胜。而更重大的天然障碍则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方音方言差异很大，没有统一的国音国语之前，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拼音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在此长远过程中，必需先有一种补救的过渡办法，这就是注音汉字和简体字。这两项工作，他和黎锦熙先生分工合作，黎任前者，他任后者。

注音符号，不作为独立的文字使用，只是放在汉字旁边的标音工具，认识汉字扫除文盲的拐棍，只要学会符号和拼法，就可以简驭繁。所标的音，以国音为标准，又是推行国音不可少的工具。但不作为字母独立使用，所以，只属于一种不得已的过渡

办法。

简体字的源远流长，汉字几千年的历史，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草，等等，表明它无时不在由繁入简，在节省笔划方面下功夫。但到了书版刻印发达之后，字体笔划相对地固定下来，尤其科举时代，考卷和正式公文等，都不准写“破体”，否则就触犯“功令”。因此，人们对于简体字的地位，不免轻视，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上，人民群众依然随便节省笔划、创造新字，混写一气。而一些有识之士，也起而效之，认为“简体省力半”。钱先生有见于此，曾在一九二二年教育部国语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方案”，为此又组织了一个有关的会，推他任首席委员，但未能积极推行。到一九三四年，上海出版界铸造了几百个“手头字”，在报刊上运用；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兴趣。他正在病假休养中，还是动手搜集，订下“述而不作”的原则，想编成一部《简体字谱》，并向国语会提出方案，经大会通过，并委托他起草。次年，第一批简体字由教育部公布三百二十四字，这是简体字得到官方承认并公布的第一次。解放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又陆续公布了大批。无论制字原则或具体字的制定，筚路蓝缕，钱先生之功不可忘。

不守师说 重估经学

钱先生研究经学，曾受教于两个不同学派的老师，一是章太炎，主古文经学；一是崔适，主今文经学。两人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经学大师。但这两派各自笃守“师说”、“家法”，门户森严，从汉代以来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互相对立。一般讲，前一派偏重于文物训诂、典章制度的研讨，对于经的本身多采取“信古”的态度。后一派偏重于微言大义的阐发和新创，对于“古文经”则持